

# 现当代儒学的转化与创新\*

杜维明

**摘要：**本文从时间、空间、阶层乃至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取径对儒家传统做了深入的阐述，并着重就“五四”以后现当代儒学的转化与可能的创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儒家传统；现当代儒学；转化；创新

**中图分类号：**B222；K09；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4)08-0079-10

**作者简介：**杜维明，哈佛大学中国历史与哲学讲座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

## 一、多元多样的儒家传统

儒家传统可以从时间、从空间，可以从不同的社会阶层，乃至不同的方法、不同的取径来了解。这个传统和基督教的传统，和伊斯兰教的传统，和佛教的传统具有某种相似性。我并不是说儒学就是宗教，但作为一个精神文明，它是多元多样的。

从时间的跨度来讲，我曾提出过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构想，这个构想事实上是非常简单的，我觉得不应该引起什么了不起的争议。就是说儒家传统从一个地方的文化、曲阜的地方文化，逐渐成为中原文化，在中国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过程从先秦一直到两汉，可以叫第一期。然后因为佛教，因为道家思想的影响，在一段时间中国最杰出的思想家、知识分子不一定认同儒学和儒家传统，他们认同佛教，或者认同道家。这个潮流从魏晋一直持续到隋唐，这个时期佛教大行其道，当时的儒家还有影响，但基本上只是一个潜流。到了宋明，儒学进一步发展，儒家传统逐渐从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演变而为日本的岛田虔次（Shimada Kenji）所谓的东亚文明的体现，就是儒家传统从中国文化影响到韩国、越南、日本，乃至海外的华人社群，这是儒学的第二期发展。到了近代，就是鸦片战争开始，儒家传统受到了西方文明的重大冲击，基本上可以说不仅是退潮了，更可以说是被解构了，而且解构得非常彻底。当时中国最杰出的知识精英形成了一个批判儒学的大潮流，如果你把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还包括吴虞这些人的力量集合起来，要打倒孔家店，要批评儒学，那么儒学当然是经不住国内最杰出学者们发自内心的批判的，所以说它基本上是被解构了。解构以后，也就是“五四”以后，它是不是还有一个再发展的生机？如果有生机，它将来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据此，我提出儒学发展的前景问题，我是把它当作一个问题提出来的，并不是

收稿日期：2004-06-11

\* 本文系宋京根据杜维明教授2003年12月26日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演讲录音整理而成，并经社教授本人审定。

说它一定能发展，更不认为它会一枝独秀。陈引弛先生曾把我的相关观点汇编为一本书，取名《一阳来复》。所谓“一阳来复”，就是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的一枝很容易被摧残的幼苗，需要对它做大量的培育工作，这就是我所说的儒学的第三期发展。

任何一个重要的文明就像一条长河，它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构，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一定跟其他很多的文明进行复杂的学术沟通。从空间来说，儒家当然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我曾提出过“文化中国”的观念，这个观念里面的资源非常丰富，儒学只是其中之一。道家的传统、佛家的传统、民间宗教的传统，乃至伊斯兰教的传统（自元代以后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还有基督教的传统。基督教的传统远在利玛窦以前的唐代即已有景教的发展，利玛窦以后的天主教因为礼仪之争，受到了很大的阻碍，但一直在发展。到了19世纪中叶，特别是美国的传教士来了以后，新教发展非常迅速，现在基督教在中国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包括地下教会和官方承认的教会），所以它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有些学者把中国文化概括为儒、释、道三教，其实是不准确的，严格地说，从明以后还应该包括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另外，如果加上民间的宗教、各种不同的民族所体现的价值，那就更加多元多样了。所以儒家传统在广义的文化中国中，它只是很多资源中的一种资源，有的时候有影响力，有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影响力。但是不管把中国或者文化中国的概念怎样扩展，都没有办法涵盖儒家传统的全貌。因为儒家传统也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是越南文化的一部分，是韩国文化的一部分，是海外华人文化的一部分。即使是海外华人所体现的儒家传统，情况也很复杂。譬如印尼有儒教，曾经是印尼认可的宗教之一，约有一百万儒教的信徒。有一种值得重视的情况。印尼是一个宗教国家，如果你不属于某一个宗教团体，你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作为一个华人，要么信伊斯兰教，要么信佛教，要么信基督教。很多华人认为他们要信自己的传统儒教。在苏哈托之前，信儒教是合法的。可是从1965年开始，苏哈托反华的情绪非常强，信儒教就不合法了。现在他们从中国请了很多学者帮助他们恢复儒教。但是中国学者一到印尼就说儒家绝对不是宗教，跟宗教毫无关系，这对他们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作为第一流的伊斯兰学者，后来做了一段时间印尼的总统，他开始要把儒家的宗教地位恢复，受到了一些冲击。不过现在印尼的儒教已有再现的契机。

所以从空间来看，无论中国文化还是文化中国都无法涵盖整个儒家传统。再如，我在夏威夷的时候，东亚文化中心及传播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曾经做过一个调查研究。选了几个地区：韩国的汉城、日本的东京、中国的台北和香港以及内地的上海青浦进行抽样调查，了解儒家的价值在这些地区所体现的情况。这个调查研究是1980年代做的。按照联合国关于全球价值的方向，以儒家价值为标准，最能体现儒家价值的是韩国，其次就是日本，第三是香港，接着是台湾，然后是中国大陆。事实上从空间上来看，儒家到底在什么地方最能发挥它积极的影响力，那要看它的实际情况。

从阶层上来看，大家对此很容易理解。我们谈到儒家总是与知识精英联系起来的，至于它在民间社会的影响，以及和三教，和其他文化交流的情况怎样并不太清楚。至少从明代以后，儒家的价值已进入社会的底层。如《太上感应篇》可能是道家的观念，但其中有很多儒家的价值，在中国民间社会流传之广，照一些传教士的说法，在19世纪它要超出所有的《圣经》在西方流传的好几倍。当然这个比较是不公平的。《旧约》、《新约》加起来是很厚的一大本，《太上感应篇》是很小的一本，就如同《菜根谭》一样。据日本的一位教授的研究，在民间流传的“善书”就有3000多种，这些善书在民间社会的影响非常大，这里面的价值基本上是以三教且儒家伦理为主，当然也有佛家报应的观念、道家养生的观念等。

从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儒家的价值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不仅仅靠知识精英。其实知识精英所扮演的角色并不特别突出，重要的传播者是母亲的身教。在中国传统里面，没有受到文字、文本训练的母亲非常多，但是我们不要把文盲和文化价值的体现者对立起来。一个文盲可能成为一种文化价值最突出的体现者。最明显的是，所有民间的传统，夏威夷的也罢，美国印第安人的各种传统也罢，多半是通过口传留传下来的。比如夏威夷的某些宗教领袖（Kahunas），可以把文化传统中的1000多句的长诗完全背熟。所以靠母亲的身教，可以把文化价值如实传下来。到今天为止，在中国社会，就文化价值来说，对一般人最有影响力的还是母亲。这个传播是非常有意义的，从儒家传统来看是绝对不能忽视的。17世纪有位杰出的思想家，他的母亲就告诉他，“我希望你这一生都向我们传统中的两个无父之子学习”，一个是孔子，他三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还有一个是孟子，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孟母三迁”对孟子的影响。在传统的发展中母亲的影响非常大，如岳母在岳飞背上“精忠报国”的刺字、欧阳修的母亲用芦苇在沙地上训练他写字。有学者研究过，20世纪突出的人物，思想界、政治界等各方面突出的人物，受母亲影响的特别多，这个比例是很惊人的，不是50%，大约是60-70%。所以，我们要了解儒学，不能单着眼于精英儒学，要特别注意民间社会，注意介于精英与底层之间的中间阶层，譬如许多影响过大众的、普及给大众的作品，它们的作者不属于儒学的精英，但他们在儒学的普及上作了很大的贡献。像《儒林外史》、《三言》这样的作品就深具影响力。柏克莱大学教授戴维·约翰逊（David Johnson）专门研究中间的阶层，研究他们怎样把精英的文化价值传到民间及其贡献。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可以从不同的学科对传统进行研究和讨论。大约在1991年我主持了一次学术讨论会，不提交论文，一共讨论三天，在美国的人文科学院，后来出了一本小书《儒家世界的透视》（*Confucian World Observed*）。邀请的学者，有中国、日本、韩国的，也有北美、欧洲的，这些学者来自历史、哲学、宗教、经济、政治、社会、人类和心理等各种不同的学科。你可以了解到真正的分歧不一定是比较文化的分歧，日本的学者、韩国的学者、中国的学者之间讨论的问题互有沟通，但是不同科系的研究中间的沟通则非常困难。比如说历史学家对儒学的研究和哲学家就有相当大的矛盾。我有时候开玩笑说，如果在历史学方面的朋友说我也是研究历史的，在哲学方面的朋友说我也是研究哲学的，这是朋友；我的学术界的敌人，或者说批判者，在历史界的人就说我是研究哲学的，在哲学界的人就说我是研究历史的。这中间的矛盾冲突非常明显，作为一个历史学界的人认为我不做事实描写和分析，即是对我的批判；哲学家认为我只能考证历史问题，也是一种批判。宗教研究和哲学研究有所不同。宗教研究说我们讲究体验，哲学研究说你讲究体验就是主观主义；从政治学角度了解儒家的权威（政治学者在美国的影响非常大），儒家就被看成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着重讲它的官僚系统、讲它的专制体系；从社会学角度了解儒学，就注重它的家族制度，注重社会价值的传承；心理学家对儒学的研究，比如在香港有几位学者，很有名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麦可·邦德（Michael Bond），用儒家的心理学的模式挑战西方个人主义的模式，这中间他也发展出很多论据、很多试验的方式。

这样看来，从时间，从空间，从不同的社会阶层，从我们的科研，所展现出来的儒家传统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传统。而我现在要做的工作、我想要提的问题，是这种错综复杂的研究中间的一个思路，我不能够概全，因为有很多地方我根本没有什么理解，我甚至没有资格做一个儒学的专家和儒学的学者。那么复杂的传统，你只是这个大的传统中的一个研究者而已，而且研究的范围非常狭窄。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来讨论一下儒学在现代和当代，也就是

“五四”以后发展的情况。

## 二、一阳来复：“五四”以来儒学的转化

在“五四”的时候，对儒学进行过严厉的批评，甚至有人提出中国应“全盘西化”，如胡适，以及后来的陈序经等（后来胡适变了，觉得不能讲全盘西化，太绝对了，应该讲充分现代化）。但他们在讲全盘西化的时候，对传统是非常熟悉的，而大多数人对西化却很生疏。所以，讲西化在那个时候是有预见性的，向未来看，要学习西方，当时大半的人不要学习西方，我们要学习西方。现在则是西化大盛，所以一讲到传统，就觉得很生疏。所以，在当时那个情况下，胡适他们特别强调中国文化，特别是受儒家影响的负面的东西。当然儒家文化在中国的思想长河中间起了很多负面作用，这是必须承认的。因为负面东西的力量太大，所以我们要学习西方，即使有心百分之百地向西方学习，最多还只学到40%。假如我们说一半要学习中国文化，一半要学习西方，那么我们学习西方只有10%的成效，所以必须矫枉过正。就是尽量要把问题推向极端，才能够把西方的价值：自由、人权、民主、科学带进来。胡适讲充分现代化时就是抱着这种心态。陈独秀、鲁迅等也都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因为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所以说要全盘西化，这与我们现在完全不同。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传统文化的积淀了，传统已经被打碎了。“五四”那代的知识精英里面，再偏激的人，他的传统文化也是非常深厚的，而且正因为他的批评性非常强，使得这个传统文化包括儒家传统中的阴暗面，被以放大镜的方式暴露无遗。比如说三纲问题、专制政体的问题、社会上各种不同的习俗问题，鲁迅所说的国民性问题，胡适提到的包小脚问题、纳妾问题、抽鸦片烟问题、懒散问题，孙中山批评的“一盘散沙”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在文化传统极深厚，特别是心灵的积习特别深厚的情况下被提出来讨论的。即使如此，他们受到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包括儒家文化的影响还是非常深刻的。

我再举一个例子，跟中国没有关系。大家都认为日本的现代化从明治维新开始，把整个儒家传统给抛弃了，尽心尽力向西方学习，逐渐发展出一套西化的理论，使之成为西方文明的一部分，被称为“脱亚入欧”，这个“亚”就是指中国文化。大家一般的讲法说中国历史的包袱太沉重。而日本一下子就丢掉了，马上就变成了世界文明的一部分，成为世界文明的重要参与者。在影响日本的现代化的知识界中，最杰出的学者就是福泽谕吉（Fukuzawa Yukichi）。哈佛的教授奥尔·克瑞（Al Craig）是研究福泽谕吉最杰出的学者，他已经研究25年了，他的书现在将要陆续出版。两年前哈佛燕京在苏州开会，特别讨论了福泽谕吉。他说一个现象值得大家思考。福泽谕吉的中国的训诂学、中国的学问是非常好的，特别是儒家传统。他在讲“脱亚入欧”的时候，是跟“五四”的知识精英一样，也深受这种文化的影响。他现在要背弃这种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要进行对自身的批判。奥尔·克瑞教授讲了这样一段话：福泽谕吉对中国的古代典籍下了非常大的功夫，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问题。他抱怨他的同辈们：“我们中的一些人，到处去炫耀他们的汉学。他们说他们看过了《左传》，其实只是《左传》中背过几段便去炫耀。我《左传》看了十三遍，我并不炫耀。”《左传》看了十三遍的人，我不知道在国内有多少，至少在国外是很少见的。再加上最基本的典籍，四书五经之类的他都非常熟悉，大概四书还可以背之成诵。你再看伊藤博文，再看围绕着明治天皇搞维新的那些志士，都是对儒学研究非常深的人物。京都大学副校长渡边浩（Watanabe），就是丸山真真的传人，也是研究日本思想史突出的学者，他说日本真正的儒学发展是在明治维新以后。但是它也有负面的作用，儒家的传统和日本的神道结合起来，后来造成了日本狭

隘的军国主义。所以他们现在开始对儒学作些反思，认为儒学是日本民族凝聚力很重要的一个力量，但它和神道结合在一起，也是使日本变成帝国主义的一个因素。因为日本的神道基本上来自日本的国学和古学，但是即使在神道的影响下，在所谓的国学传统研究中还是有很多的儒学因素。

当时有一个口号，说要把儒学、把传统包袱丢掉。如果说是包袱，有几个基本的预设，首先就是它是身外之物，否则就不是包袱；另外就是可以丢掉。但是据我们的了解，它不可能是包袱，它的影响力，已渗透到了你的骨髓里，渗透到你的血液里。你要脱胎换骨，很难。你想把它像包袱一样丢掉，然后就能西化，更难。这力量非常大。这是一个情况。另外在当时讨论的四个复杂的问题，把它弄简单了，或者说是弄成了一个问题，就是把“体”的问题，变成了“面”的问题，变成了“线”的问题。所谓“体”的问题，有四个不可分割的侧面。一个就是对传统的承继和扬弃。如果不能继承传统，不能把传统的精华继承下来，不去了解传统的精华和糟粕之间复杂的关系，就没有办法扬弃。你扬弃的，有时多半是精华。对西方，或者是国外的思想，你不能够有某种主动自觉的理解来承继，而是全盘地接受、拿来主义，绝对拿来。日本学习西方的情况和我们学习西方的情况距离太大。你可以看到日本学者小心翼翼、逐渐逐渐地把西方的一些价值引入。日本到外面去旅游或者到外面去调查的人，目的性非常的强，从德国学什么、从法国学什么、从美国学什么、从英国学什么，在国内已经讨论得非常细致。即便如此，日本对西方的了解还是有它的片面性。假如我们没有这种主动自觉（主动自觉就是我们自己对自身的文化认同和文化遗产有没有深刻的理解），那么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扬弃的工作就做不好，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和排拒也绝对不行。你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粗暴的，你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也一定是肤浅的。对于传统怎样去理解它，它的精华怎样去开发，它的糟粕怎样去批判；对于西方的文化怎样进入它的语境、进入它的环境，是深刻的引进而不是对它的一些浮面的现象进行毫无选择的输入，这四个问题同时出现，应同时解决，没有捷径可取。正因为如此，如果说没有强烈的批判，既没有办法对传统文化的精华进行开发、对糟粕进行扬弃，也没有办法对西方文化的引进进行排拒。正因为这种批判精神非常强，所以任何一个人，对他自己所认同的传统不先做认识、理解和分析，而希望把这个传统在自己这里发扬光大是不可能的。国内有些学者对我素来尊重，说杜教授是弘扬儒学、宣传儒学的，我却认为这是对我严厉的批评。如果说我对儒学没有充分的理解，对它内在的阴暗面没有充分的认识，我不能够对它的精华用现代的语言进行阐述，而只是一味要宣扬它、弘扬它，这能做到吗？比如在基督教，那些宣扬基督教的传教士，在学术思想上看起来都是低层的，真正有能力反思基督教的都是神学家，而神学家基本上是和哲学配合起来的。比如说卡尔·蓝纳（Karl Rahner），那时我很想和他见面，但是错过一个星期，他过世了。他对20世纪天主教的影响，可能要比教皇还要深远，这是在《纽约时报》及其他书评中谈到的。教皇的影响当然非常大，到任何地方都是成千成百万的人欢迎他，但是从天主教发展的长河来看，它的影响是会逐渐退缩的，特别是它对女性主义的理解不够，对世界上很多复杂的问题的理解不够等等，一味地想要宣传天主教并不济事。最近教皇到了拉美，拉美地区大多数是信天主教国家，但是很多拉美人开始接受新教。因此教皇感到了危机而前往布道。毫无疑问这是一位弘扬天主教的大师，但他在学术思想上的影响是没有办法和蓝纳相比的。国内的学者对蓝纳知道得很少，但是他确实是神学界的第一流人物。所以我一开始从事一些比较文化、比较宗教研究工作的时候，就对西方最杰出的神学家的思想进行了解，读他们的作品。希望得到机会对话，能够从他们那里得到资源。而对于一般的传教士和传教士

在教堂发表的言论，即使包括比利·格兰（Billy Graham）一开讲就有100万的听众，他肯定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实际上从长远来看，是没有办法为基督教创造新的价值的。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认为在“五四”时期，儒家传统受到了一批最杰出知识精英的批判，这对儒家传统能不能继续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他们的严格批判，不把它阴暗面全部暴露出来，它的真正的价值就很难体现。所以我说对儒家残害最大还是军阀、官僚，或者有政治权力的人想办法从内部来腐蚀，儒家越受到袁世凯的宣传、受到张宗昌等人的提倡，儒家的生命力在很多知识分子心中就越没有任何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但是我们也要分开来说。张宗昌和袁世凯可能是对儒家一无所知，想利用它；但是阎锡山却不一定。我看过阎锡山的关于儒家价值的材料，他对儒家是下过功夫的，不能一概而论。蒋介石在台湾对儒学进行政治化的宣扬，这使得儒学在台湾的知识界受到了很大的质疑。正因为要在政治上的宣传，使它成为一种政治压力、一种象征系统的主导，对一般知识分子来说就有一种压迫感。但陈立夫在晚年对儒家下过功夫，他的《四书道贯》很可以一读。华东师范大学的冯契先生讲的古今中西之争，他认为这是近现代中国所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古今中西之争基本上就是传统的继承和扬弃、西方文明的引进和排拒之间的复杂问题。一般的理解认为比较成功的是日本。日本的本土化和国际化配合得比较好，所以越国际化，则日本性和本土化越强。你如果到日本参观一下就能感受到这一点。1967年我和唐君毅先生从京都路过天理而到奈良，我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你从那里可以看到唐代所遗留下来的庙宇的风格，日本人的生活习惯、茶道、书道，还有中国的鉴真和尚所带到日本的很多中国文化的价值，都还在起作用。那么它的西化常常是通过本土化方式来进行的，怎么样能够把外来的文化内化，成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当然他们是有经验的。他们说日本文化是属于本土化的传统。日本不是一个轴心文明。轴心文明是什么呢？是希腊、印度、中国和犹太。比如说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中国的儒家、道家，在中东开始是犹太教，后来发展成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些都是轴心文明。就是雅斯贝斯（Karl Jaspers）所讲的轴心时期文明（Axial Age Civilizations）。日本不是，日本等于是一个地方性很强的文明，你看他的神道、他的神话等都是地方性很强的东西，而日本消化了两个轴心文明，但却没有出现消化不良的情况。第一个就是儒家传统，确实变成了日本文化的一部分。我们要了解日本的儒学跟中国的儒学是绝对不同的，中国的儒学一定是以仁义礼智为核心价值，日本接受儒学影响的是它的武士道。因为它的武士道有很长时间没有办法从事战争，都变成官僚了，加入了官僚系统，所以受到儒学的影响很大。日本不特别强调“孝”而主要讲“忠”，日本的宗法血缘观念非常淡，日本有养子制度。很多在中国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儒家价值，到日本都变了。但是不能说日本的儒家不是儒家。

日本在充分的国际化和充分的本土化方面做得很成功，日本的“脱亚入欧”做得也是成功的，它是所谓的世界八强之一，是唯一进入欧洲文化圈的亚洲国家。亨廷顿在讲文明冲突的时候，把世界上分成很多不同的区，认为对西方文明构成挑战的一个是伊斯兰，一个是儒家文明，但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把日本剔除出儒家文明，说日本不属于儒家文明。为什么呢？日本的经济是世界第二，把日本剔除出儒家文化圈是他的冷战心态的表现。但是日本是不是属于儒家文化圈？这是日本学者一直在辩论的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因为“脱亚入欧”的成功，就尽量地淡化和儒家有关的东西，所谓“脱亚”的“亚”就是指中国，叫“去中国化”，跟台湾目前的文化走势有相似之处。既然要去中国化，就表明日本从历史上看和中国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但是美国日本研究最杰出的学者，以前也是哈佛燕京的负责人之一——赖世和（Edwin O. Reischauer），曾任美国驻日大使——是中国汉学和日本研究方面

很突出的学者，他在 1974 年就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了一篇非常有影响力的论文，就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他的看法，批判“日本特殊论”（Japanese exceptionism），他坚持一定要把日本摆在“中华文化圈”中，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当时日本的学者群起而攻之。赖世和在这篇文章中就指出：如果日本能发展，将来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这四个地区也会发展；如果这四个地方发展了，将来越南也会发展。1974 年的时候越南战争还没有结束，1975 年才结束。他说如果越南发展了，中国也会发展，特别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方面发展。很短的一篇文章，讲得非常清楚。另外一个预言现在还没有实现：北朝鲜会发展。这就是儒家文化圈。儒家文化圈涵盖日本、四小龙和社会主义东亚，包括越南、中国大陆和北朝鲜。最近密歇根大学的英格哈（R. Inglehard）教授提出所谓“世界文化地图”，这个“世界文化地图”中所谓的“儒教圈”就是这些地区，那么现在的日本算不算在其内？除了日本的国际化成功、本土化成功，现在日本要区域化，现在日本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再亚洲化”、“回到亚洲”。一回到亚洲就遇到了韩国和中国的挑战，日本会认为，将来日本是亚洲文明的一部分，还是日本现在接近的欧洲文明的一部分？这是他们所面对的一大挑战。

面对这个问题，来看中华民族的再生、中华民族的腾飞，意涵是非常丰富的，有经济含义，当然也有政治含义，甚至有人说有军事的含义，后面所带来的文化信息是复杂的。对于国际社会的重组，对于国际新秩序的出现，对一种面向 21 世纪的新人文主义的发展，我们能提供怎样的精神资源？回答这个问题，不可能只是官方，或者是少数的知识分子，一定要通过一个非常复杂的步骤。各种不同类型的公共知识分子，比如政府的、学术界的、企业的、媒体的，乃至各个不同的社会团体、社会组织，大家共同来建构这一理念、这一愿景。如果这只是一个空洞的论说，而没有影响政治、没有影响国策、没有影响外交，那就没有办法具体落实。但是即使如此，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空想，它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这个现实意义，如果落实到外交，就是 1979 年以后中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持一种“和而不同”的观点，具有非常大的弹性。这是中国外交政策比较成功的关键所在。但是，中华民族的再生所包含的文化信息将来会怎样？西方的学术界、知识界、文化界，或者是日本的、越南的、韩国的，都非常关注这样一个课题。就是中国文化何去何从？

这中间有这样—个背景，在此简单地提—下。从 17、18 世纪开始，西方发展出—种所谓的启蒙心态。我们说的“启蒙”是—种文化的运动，是—种还在发展的理念，也是—种复杂的心态。哈贝马斯说希望把启蒙再发展下去，我认为这是人类文明影响最深的思路。不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是启蒙发展出来的。我们现在的大学制度、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的出现，都跟启蒙有关系。但是这个大潮流现在碰到了很大的困难，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因为它是人类的中心，对物质主义发展的关注，导致了严峻的生态环保问题；它是强势的个人主义，现代社群理论对它进行了批评；另外它是一种带有侵略性的浮士德精神，以“追求富强”为目标，从过去的殖民主义到帝国主义的发展，都跟它有关系。现代生态环保的困境和战争的问题，乃至世界上发生的贫富不均，还有各种的国际化造成的反全球化运动，使大家觉得——不仅仅是我们，还有西方的杰出知识分子，都认为启蒙所代表的启蒙理性，没有办法带领人类走过 21 世纪。就像解构学、后现代、各种女性主义等，很多人基本上都对启蒙进行严厉的批评。

从这方面来看，儒学、特别是新儒家的儒学，在“五四”以后逐渐地得以发展，现在可以说是“—阳来复”。那么到底文化的涵义是什么？有关对所谓现在新儒家的理解，和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教育部所支持的方克立先生所主持的十年计划有关系。当时他们提出来的一

共是十个人，参加的有十七八个单位，有四五十位的学者。他们集中讨论的是十个人，有张君劢、贺麟、冯友兰、梁漱溟、熊十力、钱穆、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有个构想：出30本书，先为每人做一个学案，然后每一位出一本论文集，对他们的思想进行一个评估，再有10本就是对他们进行批评。基本上要做的工作不是要宣扬儒学，而是对海外的新儒学进行一个全面的理解研究之后，进行彻底的批判。这十位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现在来看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从中可以看出儒学的现代转化和儒学创新的可能。

张君劢大家都很熟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和梁启超一起到欧洲游历，回来以后就进行所谓的科玄论战，实际上，科玄论战对他是不公平的，因为他提出出来的是人生观的问题。当时在胡适、丁文江等科学主义的导引下，对人生观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评，大家认为科玄论战中科学取得胜利。我们重新回顾那个时候的论战，发现张君劢提出的很多问题，如人生的价值问题，人除了拥有科学理性以外，还有很多无法量化的、无法理解的能力，他的很多观点到今天还没有过时。他因为曾留学德国，对德国的理想主义很感兴趣，后来在美国他一个人写过一本关于宋明理学的书。大家都认为他是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的知识分子，他曾经参加过民国宪法的起草，在这方面有他自己的见解。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晚年。最后他一个人一二十年都住在加州的奥克兰，一个人办了份杂志《自由钟》，出了100多期。在这份杂志中他对于自由等各方面的理解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第二位就是贺麟，我在上世纪80年代去看他的时候已经绝口不谈儒家，只想从我这里知道一些西方社会科学的东西，但是他是通过黑格尔，把王阳明和黑格尔结合起来，这和冯友兰把朱熹和新实在论结合起来有很大的不同。很明显，这几位都是真正浸润到西方文化之中的学者，也可以说儒家传统从“五四”开始经历了一个西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从西方最核心的一些传统来进行比较研究，来发扬他自己的内在价值。

梁漱溟先生没有出过国，但是梁先生在1923年所写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基本上是把人类文明按照印度文明、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加以分疏，他有一个国际视野，而且对此也有很深刻的理解。我和他见过好几次面，其实他的终极关怀是佛教，他说现在不得已要研究儒家，要经世致用。大家都很熟悉他在分析这三种文明的时候，说印度的文明是舍离的文明，西方的文明是进取的文明，中国的文明是中和的文明。在现阶段，中国一定要向西方学习，不向西方学习就没有办法生存，但是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前景来看，不要忽视了印度文明包括佛教文明，将来对于人的安身立命，特别对西方年轻人会有影响，他这个预言不一定会实现，但是很有启发。即使连熊先生，他是在支那内学院师从欧阳竟无大师研习佛学的，他的《新唯识论》的基本资源来自佛教。孟旦(Donald Munro)在大英百科全书中介绍熊十力先生，说他深受柏格森思想的影响，这个说法是不全面的。因为熊先生自己很明确地说有人认为是我的思想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相近，其实是大不相同的。因为柏格森所称的心理是人的一般心理，我所讲的是属于本体论层次。他认为自己的观点比较接近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过程哲学。所以熊先生完全是在东方语境，特别是中国语境中思考的，但他对于西方有一定的理解，是愿意解读的。所以，1919-1949年的一代新儒家中，没有一个是抱残守缺、盲目认同传统，对西方进行排拒，这是事实。我们看他们的作品就非常清楚。

再回头来看，从魏源、龚自珍以后，戊戌政变之前，像康有为和梁启超，都是对西学有强烈的认知的，甚至连曾国藩，国内也已开始慢慢对他重新评价。曾国藩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大儒在自强运动中所体现的一些价值，如送100多位儿童去西方，向西方学习，要发展工业，甚至在制度方面、人才培养方面，都积极推动西化。我觉得可以接受日本渡边



浩的观点，他认为：至少在日本，真正能够以一种开放的心灵向西方学习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儒者。我们应该想想为什么受儒家文化影响这么深的这些人对西方那么开放？康有为很欣赏华盛顿，他说华盛顿已经是一国之尊，结果不愿意做皇帝，大示尧舜禅让之风。这个怎样去理解？当然有受到儒家文化影响而特别讨厌西方文化的，像倭仁等很多清朝的高官，有学人认为他们在体现儒家文化，而梁启超等不在体现儒家文化，这个观点我不能接受。

1949年建国以后，真正的儒学发展在海外，在港台。香港主要是新亚书院，台湾主要是东海大学，台湾大学也有些学者。这些学者中，比如方东美是一生研究希腊哲学的，他在台大开的课程全是讲希腊哲学的，他的“科学哲学与人生”中所掌握的智慧主要来自希腊哲学。他是方苞的后人，因此是桐城派，他的文笔非常古雅。如果不懂古代汉语，他的文章是很难读懂的。他后来到了美国讲学，受到了美国学者的刺激，开始从事儒学研究和讲儒学，他用英文讲儒学的东西也有一定的影响力。他的及门弟子，像刘述先、成中英、傅伟勋，都是直接师从方东美先生的。毫无疑问，他们对西方的学术都有很深刻的理解。唐君毅先生在香港的新亚书院，他对西方黑格尔哲学的浸润是没有什么可争议的。在1969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宋明儒学中心由狄百瑞(W. T. de Bary)和日本的冈田武彦(Okada Takahiko)主持举行的“宋明儒学研究”，是真正地把现代儒学的信息直接带到美国去了。因为他们的影响，美国学术界有了很大的变化。由哈佛大学的费正清和耶鲁大学的亚瑟·莱特(Arthur Wright)所主控的美国学会联合会，当时连续推出了五本和儒学有关系的书籍，包括《儒家的人格》、《儒家的政治》、《儒家的实践》等，那是美国学者当时对儒学的理解。这五本书基本上是把儒学当作政治意识形态(political ideology)或者说是政治文化。但是因为唐君毅先生、冈田武彦先生、狄百瑞先生，特别是陈荣捷先生，从那个时候就已开始发掘儒家文化的内在资源，研究儒家不能只当它为一种政治文化，几乎最重要的儒家学者没有一个是研究儒家政治文化的。1966年，在伊利诺斯厄巴那(Urbana - Champaign)的伊大召开了“明代思想：自我与社会”学术讨论会，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那时我还在哈佛修博士学位，刚刚口试考完还在准备写论文的时候参加的。会议论文集就是后来出版的《明代思想中的自我和社会》(Self & Society in Ming Thought)，这是一本在美国学术界从儒学是政治文化转到我们现在所称的心性之学或者是生命哲学这一角度思考的最重要的一本书。后来顺着这种思路为宋明儒学的研究开辟了新方向。这和唐君毅及冈田武彦到美国很有关系。

牟宗三先生，中国的康德专家。在他去世前是以全部的精力做康德的翻译。他把康德的三个批判都进行了翻译。平生翻译康德的一个批判已经是非常圆满的了，而牟先生则是将三个批判都翻译出来了。牟先生在大学的时候就研究康德，虽然有人说他不懂德文，怎么能研究好康德呢？他研究康德有他自己的问题意识。他认为要真正进入西方哲学的核心，必须要找到西方最有影响力的大学者，他认为康德是西方思想界中无法绕过的一位重大的思想家，所以他一生都是在从事康德的研究。因为他受到熊十力先生的影响，也受到唐君毅先生的启发，因此他研究康德的问题意识不是旧时代康德研究的专家，而是希望通过康德对中国的心性之学进行一个新的诠释。而更大的野心，就是能不能通过中国传统的心性之学，特别是孟学中的心性之学疏解康德哲学的困境？现在很多学者，中国的也好，外国的也好，都不愿意接受，但是我们向前看的话，这种说法也不一定完全没有说服力。康德哲学是从“人学”概念衍生出来的，但并不重视道德感情。康德讲“道德定律”的时候对“情”的问题没有积极阐述。牟先生认为，把康德哲学的自律道德和中国的心性之学以及孟学中的“四端”结合起来，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牟先生的哲学在台湾影响很大。他在台湾的弟子号称“鹅湖学派”，像李明辉到德国拿到了博

士学位，博士论文就是关于康德哲学中的“情”的问题。现在跟牟先生有关系的至少有十几个学者，在美国、德国拿到博士学位，进一步在做这个工作。

徐复观先生事实上和西方没有什么特别关系，但是在阅读他的文献的时候，会发现他是真正通过日文对西方的学术思想作了很多的研究，因为我是他的学生，所以我非常清楚。他自己的贡献是在两汉思想，在《文心雕龙》的研究，发展成为中国艺术之精神，再者就是在政治与学术方面，出版过很多的论文集。

唯一和西方的思想没有什么纠葛的就是钱宾四即钱穆了。这是一个例外。

### 三、结语

这样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儒家传统是经过了一个西化和现代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非常全面、非常深刻的，绝对不是从前张之洞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么肤浅的模式。像严复在做了那么重要的翻译工作之后，他说“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这是他对西方学术、西方现代精神的一个概括。这个概括非常重要。在“五四”前期，中国最主要的观念是自由和人权，后来因为救亡图存和其他的理由，才突出了科学和民主。科学后面是追求理性的价值，民主后面所代表的则是人权和自由的价值，这在中国没有很好发展。所以我也同意李泽厚先生说的“救亡压倒了启蒙”；但是“救亡压倒启蒙”并不能击中“五四”心态的核心。当时有一个很强烈的要求：只有启蒙才能救国，只有通过学习西方才能救中国。这种观念太强了！所以，当时儒学和其他的一些传统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质疑。所谓不公平的质疑，就是拿西方最突出的价值如科学和民主，来对儒学进行拷问：如果儒家传统没有发展科学、没有发展民主，那就没有价值。没有想到一个重大的精神文明，它会有很多其他的价值。没有充分体现自由的价值，却有公益的价值；没有理性的价值，却有同情的价值；没有法的价值，却有理的价值；没有人权的价值，却有责任的价值；没有个人主义的价值，却有社群伦理的价值。这中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所以像陈来先生就提过：我们为什么不要求基督教开出科学和民主？看天主教，还有教皇，他们坚持妇女不能做神职人员，这当然不民主。基督教也没有开出科学，但对科学家却有深远的影响，牛顿是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才开始研究科学的，他并不是要做一位了不起的物理学家。即使连爱因斯坦，他是犹太教的，也认为上帝是不会为了人类掷骰子，因此他不相信以或然率为核心的量子论。这些都可以说明我们对儒学，如果要进行完整、正确的了解，就要看它的资源是什么。既然在现当代的传统儒学观念里面，我刚刚提到跨两代的十位思想家，都充分地通过西化和现代化，对儒学做一个非常严密的内部的批判，“三纲”基本上被批判掉了。所有在儒家传统里面跟自由、人权、民主、科学相违背的，都经过了非常严厉的批判。那么，它还有没有很大的生命力？我认为有，不光从理论上。这没有办法细说了。至少在个人、社会、自然和天道四个层面上，儒学有其独到之处。个人的身心灵神如何能够综合成为一个完整的个人？个人和社会，从个人家庭一直到人类社群，能否进行一种健康的互动？人类和自然能否有一个持久的和谐？人心和天道能否相辅相成？西方的现代理论，特别是西方的政治理论，一直到现在（也包括哈贝马斯在内），只提出一个向度的问题，就是个人和社会的问题，没有接触到人类和自然的问题，更没有接触到人心和天道的问题。因为哈贝马斯不了解宗教，在他的理论内部更没有自然生态环保的一定位置。儒家所展现的人文精神，这四个侧面都是配合起来的。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至少在宇宙论和人生观两方面，儒家的人文精神确有光明的前景。

（责任编辑：王恩重）